**时 文 美 文**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2015级

高一（下）第04期 （总12期）2015-04-14

本期主编 李新林

=========================================

**外交部官员谈公民海外乱象：有时国家形象输得很惨**

4月12日，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举行领保工作座谈会。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领保中心主任翟雷鸣在会上表示，一些中国公民在境外不知道规避风险，违反当地法律，到处乱刻乱画、乱丢垃圾等，既给后来同胞带来了负面影响，也挥霍了国家资源、影响了国家形象。

|  |
| --- |
|  |

　　翟雷鸣在会上做了题为《中国领事保护工作与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的讲座。他指出，中国目前有大批企业和个人走出国门。近期一些中国公民的在外形象问题引起国内外各方的关注与争议，这其中也有我们企业和公民自身的问题。

　　翟雷鸣指出，领事保护保护的是合法权益，作用是有限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多中国公民在海外没有守法的意识，如有的广西同胞到加纳淘金不守规则，就引起该国打击和国际舆论炒作。加纳政府的官员曾在飞机上指着满目疮痍的矿区，对我们工作组的人说这些人在祸害当地环境。但为了同胞的利益，有时候也不得不保。经过各方努力，中方人员的采掘工具和合法所得被允许带走，且无人因此坐牢。

　　“我们领事保护是赢了，是得分的，但实际上国家形象输得很惨。如果这样纵容这些不法国民，那双边关系能好得了？”翟雷鸣说，“任何一次领事保护都会付出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这付出的是国家的外交资源，牺牲的是双边关系，甚至是众多外交官多年来在该国培育的人脉和关系。这些资源不是这些违法公民的，而是全体国民的。”

　　翟雷鸣说，在非洲一些国家的边检，海关官员对中国人的检查非常严格，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少同胞确实经常携带不该携带的东西。“在很多地方，见到持中国护照的就会敲诈钱，这很多是自己人造成的。很多中国人喜欢花钱买平安，久而久之那些人就想制造麻烦要钱。”他说，“很多人相信能花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这带来了很坏的后果，给后来的同胞带来了麻烦。这是很让人痛心的。”

　　翟雷鸣还谈到了中国公民在海外的素质问题：“极少数人，在海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羞辱，如在飞机上打架，在一些风景名胜区胡乱刻画等。有人去马尔代夫潜水，拍了两张水底照片，一张拍到了中国香烟的烟盒，一张则有中国产矿泉水瓶的瓶子。”他认为，“离开了中国，任何一个中国人就是中国的全部。外国人会觉得你就是中国，就代表中国。你的不文明行为，会对中国形象和国家资源带来损害。”

　　翟雷鸣指出，对不可避免的领事保护，政府责无旁贷，但因为个人原因造成的损失，是不应该的。如有些人会在非洲非法走私象牙和犀牛角，国际媒体会放大炒作。有做工程的工人在中东国家光着膀子上街，被人追打。穆斯林国家禁酒，却有到沙特的人在行李里强行带酒，被抓后判半年监禁并打五十鞭子，使馆官员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将其解救出来。柬埔寨西哈努克太皇逝世后，有成衣厂工头撕毁其画像阻止工人怠工。此外，一些企业在海外的项目没有造福当地民众，还占用了其资源，也很容易引发与当地人的纠纷和对立。

翟雷鸣指出，领事保护是政府行为，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保护持中国护照的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这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领事保护要依据合法的原则，依法行事，要有理有利有节，不能代替当地行政和司法部门进行仲裁，不能干预其他国家的司法独立。“大家应该牢记，到海外是有风险的，凡事应先把风险考虑在先，居安思危，发展好首先要保障自身安全。”他说。

**谁在海外给中国人丢脸？**

风青杨

4月12日，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举行领保工作座谈会。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领保中心主任翟雷鸣在会上表示，离了境，任何一个国人就是中国全部。你的不文明行为，会损害中国形象。比如在飞机上打架，在风景名胜区胡乱刻画。有人去马尔代夫潜水，拍了两张水底照，一张拍到了中国香烟烟盒，一张是中国矿泉水瓶。（中国新闻网）

近几年来，走出国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但仔细反思一下中国人在国外的表现，不难看出，其实是我们自己糟践了自己。有媒体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出境游的人的印象作过一个调查，中国排在倒数第二（日本人是正数第一）。外国人为什么瞧不起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给世界人的坏印像，主要有几点：一，公共场合嗓门大；二，不守秩序不排队；三，卫生习惯被诟病。比如：随地吐痰，上厕所不冲马桶等。除此之外，中国人还爱占小便宜，喜欢顺手牵羊，并拒绝给服务生付小费。

有人说在国外的景点旅游，根本不需要怕走丢，只要听声音就准能找到自己的团队。因为哪里扎堆的人多，嗓门大，一定就是中国的旅游团了。一些游客出门旅游，似乎没有维护公共场合秩序的意识。无论是在餐厅吃饭，还是坐公交车，高声接打手机、大声喧哗、吵闹的人并不少见。只要凑成堆，大家就会扯开嗓子，高谈阔论，完全无视旁边其他游客是否愿意倾听。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爱照相，无论在巴黎的卢浮宫，还是伦敦的西斯敏斯特教堂，抑或是布鲁塞尔的“小尿童”前，蜂拥而上、吆五喝六、争先恐后照相的绝大部分是讲汉语的。无论是在唐人街，还是在地铁、飞机上，总有我们的同胞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话，仿佛公众场合就是他家的客厅；我们的一些同胞喜欢贪小便宜，上麦当劳、星巴克喝杯咖啡，还不忘了“贪污”一些人家的餐巾纸……

说欧美发达国家这样，很多人总能找理由说别人比我们多发展几十年。那就拿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非洲来说。按理来说非洲人对中国应该是“感恩”的，因为中国从1956年开始向非洲50多个国家援建了900多个成套项目。2009年，中国的外交支出为251亿元，其中133亿元用于对外援助，且援助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但我们对非洲无私援助，我们的国民在非洲工作、生活愉快吗？

首先，在非洲人看来，中国人“什么都吃”，不尊重他们的饮食传统。中国人在非洲，所到之处都搞“三光”政策——猪光、鸡光、野味光。在埃塞俄比亚，驴是相对神圣的动物，但中国工人在这里却偷吃驴肉，也引发埃塞人的不满。在加纳等西非国家，采金者则经常猎捕穿山甲、鳄鱼等野味，这种行为也招致当地人的抗议。此外，不少中国人在非洲从事非法象牙交易，常常因偷带象牙出境而被海关扣留，这同样损害了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

非洲欢迎中国政府的投资，但他们得承认一点，他们并不喜欢中国人。除上叙原因之外，还有就是，很多中国老板把自己那套经营方式带到非洲，如商业贿赂、偷工减料、非法雇工、随意解雇工人、逃税漏税等。他们有的用工不规矩，不给工人上保险，侮辱工人，侵害工人权益，随意解雇工人，由此引发的与当地雇员的冲突接连不断，这些都给非洲人留下了不好的印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法律，就是道德，就是规范，就是良心。如果中国人在非洲的公司不讲法律，不讲道德，不讲规范，不讲良心，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持“中一个标是一个标，赚一笔钱算一笔钱”的短视行为，连最基本的企业形象也不顾。那中国不仅在非洲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占有的市场会很快丢失。中国人恐怕在非洲也难有立足之地。

要改善中国游客的形象，还要从日常做起。俗话说，养成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人，所以，真正知书达理的文明习惯不是靠三年两载就能培养出来的。但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儒教传统和温文尔雅是闻名世界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深为自豪的。人们常说，爱国情浓时，多在国门外。这种爱国情怀不是虚幻的，更贯注在我们的行动中，因此，我们就不妨从端正自己的行为习惯做起，在国外旅游的每时每刻都要记得当好自己的“国家形象大使”。

我国公民在道德领域里最大的、最核心的、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只有两点，第一是缺乏法律观念，第二是缺乏诚信。人们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而这两点归根结义，都可以归结为制度原因：民众缺乏公德、法治和诚信意识，是因为法治和诚信的制度不立；至于奴性、两面派和窝里斗内耗，则是市场机制不立、权力垄断资源下必然且无奈的“人性选择”……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句话来看，国人的“素质低”，不过是制度落后在人性中的必然反映。好制度使坏人欲作恶而不能，坏制度让好人欲从善而不得。如果要为中国人的“素质低”寻找出路，惟一的办法就是向新的“体制批判”迈进，由人治向法治社会过渡，让制度层面的进步不断点滴积累。一句话，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从中国游客“海外综合症”说起**

近年来在世界各地，不时传出和中国游客有关的不文明传闻，常被提及的包括涂鸦、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争抢座位、不知礼让、在酒店大堂或餐厅里喧哗等等，最“新鲜”的话题，则包括“泰国白庙厕所对华人游客禁用传闻”和“帕劳海底发现中国游客插中国国旗”之类，至于在国际航班上争位、打架、醉酒等种种“任性”，更是每逢旅游旺季必然看到几条的“常态新闻”。

这类传闻“出口转内销”后引发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有人将之归结为“民族性”或“大环境毒害”，称之为中国游客的“海外综合症”，甚至希望动用公权力，搞一套“中国公民出国行为规范”强制推行，让中国游客“文文明明旅游去，和和谐谐回家来（事实上也真有人搞了）；有人却认为是“少见多怪”，觉得之所以有这么多中国游客在海外“中招”，主要是老外对中国人失之包容所致。由于网络、媒体和众多名人对这类事件热衷参与，“中国游客素质”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动辄被提到“国民整体形象”乃至“民族性”之类“宏大叙事”的层面，成为热门话题都算“小儿科”了。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游客走出国门后，如此众多、如此频繁的不文明“指控”？

首先必须坦率承认，许多中国游客在出国旅行时，的确存在一些不文明举措，像加塞、抢座、随地吐痰，以及在非吸烟区吸烟等，都是较常见的不雅行为。这些行为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是不文明、不妥当的，当事人自己也心知肚明，不过这些人在国外表现出的不文明举措，和他们在国内的表现如出一辙，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人的文明素养有待提高。

文明素养的进步并非旦夕之功，而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背诵几句诸如“五讲”、“四不”的文明行为规范不难，将良好的言行习惯化，变成生活中不假思索就会自然遵循、不这样做反倒浑身不自在的下意识本能，才是最难做到的。事实上，许多国人在国内日常生活中，同样存在前述种种不文明行为，其在海外旅游时的种种，不过是将国内的不良习惯带到国外。游客不是“纪律部队”，对一些不文明却并不违法的小节，强制他们可以如何，不可以如何，一来难以约束，二来即便约束也只能是挂一漏万，对这种行为，惟有加强全社会的日常文明修养，国内日常生活中文明行为普及、不文明行为消失了，“丢人丢到海外”的尴尬也自然就少了。

事实上，世界各国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这种从“不文明”到“文明”的过程。中世纪末期，当时闭塞、落后的欧洲旅行家抵达正处于鼎盛期的埃及亚历山大时曾感慨“和阿拉伯人相比我们仿佛野蛮人”，如今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两个游客群体的印象却仿佛颠倒了过来；上世纪70年代，日本游客在欧美扎堆抢购奢侈品，结队光顾“红灯区”和夜店，并每每酒后作出不雅举动，也曾屡屡成为当地传媒嘲讽的对象，当时也有海牙、布鲁塞尔某些夜店用日语标注“文明守则”的报道，而如今日本人却成为国际游客中讲文明、守规矩的典范；韩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游客素质参差不齐”时，也曾客观指出，十多年前大批韩国游客刚刚走出国门时，也曾给外国人以“不守秩序”、“喧哗吵嚷”的负面印象，但随着文明行为的普及和教育水准的提高，以及出国旅行的司空见惯，这种现象如今已变得少见。2012年9月7日的《今日美国报》就曾指出，中国游客今天出现的问题，和60年代的美国人、70年代的日本人如出一辙，是出国旅行达到一定数量，而文明程度尚不及同步提高后的必然结果。

还有一些行为、现象，在中国司空见惯，不以为非，在国外却不合适，如前年德国有媒体抱怨中国客人在自助餐厅不讲究取餐秩序，用餐时大声说话、高声接手机，或发出很响的声音。这些行为在中国餐饮文化中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西餐厅里则不妥，因为欧美传统西餐厅很少有类似中国那样的大台面、大场地，灯光很柔暗，环境也较安静，即便中餐厅到了海外，倘不是纯做华人生意，一般也会在用餐环境方面靠拢当地风格。俗话说“入乡随俗”，姑且不论这些风俗孰高孰低，在别人那里做客，守别人的规矩也是常理。这些因风俗差异而致的不文明现象，只消带队者事先打个招呼，或游客间相互提醒，就会避免很多尴尬。

认真地说，中国游客远非“最不受欢迎”。实时旅游信息网站Triposo每年5月会推出一份“全球游客素质调查”，通过民调列出“最不受欢迎国家游客”排行榜。2014年的这项调查，取样范围覆盖62个国家，受访者多达700多人。在这个“海外游黑榜”上，最不受欢迎的游客来源国是美国，而中国仅列第四（当然这也不光彩，TOP10的排名是美、英、俄、中、澳、德、印、法、意、巴西），3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是全球最令人讨厌的游客（更讽刺的是这么认为的美国受访者比例高达44%，比平均数还高的多）。加拿大CTV电视台曾评论称，美国游客在类似评比中长期“名列前茅”，以至于许多美国游客在国外喜欢冒充加拿大游客。

这个榜单还反映了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上榜的要么是富国，要么是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的新兴国家，很显然，“海外游客不受欢迎”其实和“海外游客数量剧增”是成正比的，几十年前的中国，恐怕连上榜的机会也轮不上。

许多海外观察家也注意到这一点，如美国LivingSocial网站就曾评论称，中国人在国外不受欢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就包括不讲公共秩序，在公共场合总是拥挤、争抢，排队不守规矩，在机场和海关等场合争先恐后，争抢酒店和餐厅各种免费资源，登车、登船不讲先后次序，争抢座位等等，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奇迹令数以百万计中国人在很短时间里从穷人变成有能力出国旅游的中产阶级，并产生了绝对数量可观的百万富翁，这些人随着外国签证的越来越容易获得，而充分享受其在海外度假的快乐，但他们“缺乏海外旅游的经验”，许多被外人所嘲笑的“恶习”，其实正是这种缺乏经验的表现。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走向开放、走向国门外之际，都会有种种不适应（包括自己对外界的不适应，和外界对自己的不适应），罗马人之于希腊，俄罗斯人之于荷兰、法国，日、韩国人之于欧美，莫不有这样一个过程，讳疾忌医不可取，刻意夸大，并动辄将个体行为说成“民族性”同样不可取。

那么，中国游客自己，又该做些什么？

首先，文明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和习惯。如果习惯了文明，再去做不文明的事，反倒会觉得不舒服、不自在、不方便，每个人都应在国内、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积累、培养文明的习惯，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公共场合行为规范，只有习惯成自然，才能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得文明、得体。其次，对自己即将前往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习惯禁忌多加了解，“入乡随俗”的道理，其实正常人都懂，但至少要了解“乡”和“俗”，才能知道该怎样去“随”，在很多时候，国门之外的不当行为并非出于有意冒犯，而是出于对当地风土人情、行为规范的无知。

至于由政府、外交机构或窗口部门印发“文明出游须知”、“中国公民海外文明规范”之类材料，或进行相应教育，效果恐怕未必理想，毕竟，文明的言行、举止，是要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养成，“物化”的条文、规范挂一漏万，且不具备真正的约束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关方面更应该做的，是通过法律法规、社会行为规范的配套，在国内营造有利于文明习惯、风气形成、提高的氛围、土壤和规则，以及更客观、全面地向即将走出国门的中国游客介绍目的国信息、情况、法规、风俗和禁忌，使游客们对“怎样文明旅游”心中有数。

**毕福剑视频为何引发了中国人的信任危机？**

风青杨

毕福剑饭局私聊视频被曝光后，昨天央视做出处罚决定：毕福剑在央视主持所有节目暂时停播4天。同时，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发声明，撤销毕福剑爱心大使称号。或许未来还有对毕福剑更不利的消息，但网络上人们更担心的是中国人的信任危机。

正如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微博上所说：“朋友私聚，戏谑调侃，说几句不恭敬的话，何罪之有？若要处分，该处分的是那个骗取信任、拍片并上传网络者。社会影响都来自这个上传行为。处分毕福剑，无疑是鼓励无耻的背信弃义和密告，破坏人际基本的信赖。”

媒体人王志安的一段相关微博也被转发很多：“饭局上录音录像再公开，摧毁的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的重要性，超过意识形态，超越各种理想和主义。一旦失去这种最基本的信任，他人皆是地狱。人是活在社会中，不是活在主义里。那些用政治正确审视私域里一言一行的人，本质上都是法西斯。”

是啊，公众场合与私密空间如果没有界限的话，会导致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试想，你躺在被窝里和老婆发几句牢骚，都有可能成为别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这样必然导致小人横行，告密盛行。

对此《人民日报》也发表文评论《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至今“告密揭发”思维还时常作祟。某高校期末题“选出你认为翘课最多的3名同学”，这不是在鼓励学生相互揭发吗？一个“打小报告”的班级，同学、师生间一定疏远而戒备；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毁掉社会道德基础。

告密是人所不齿的行为，但自古以来却如瘟疫般。人都有隐私，都有短处。人与人之间，应当是相互帮助、取长补短。相互揭发，必然人人自危。揭发别人者并非因为自己干净，只是把告密作为打击别人的利器。如果告密大行其道，必然诚信全无，当然也是小人得志、奴才横行时代。

正是对这种情形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人人自卫”的社会。谁也不信任谁，人们互相欺诈，社会的交易成本在急速提高。但信任的重要性，对于社会生活，就像空气对于生命一样。如果我们看到食品，就会想到中毒；看到微笑，就会想到陷阱；踏上大桥，就会想到坍塌；走进医院，就会想到误诊；我们生活能正常吗？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你会生活得更为安全、更为轻松，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信心，而这一切全赖法治所赐。在法治的环境中，你在大街上不必担心警察的无故打扰，但有人侵害你时，保护你的警车会及时呼啸而至，于是你信任未曾认识的警察；你的财产不会受外力包括公权力的袭扰，而当有人侵害财产时，公权力机关会及时出面救济，于是你信任向你征税的政府；你进行交易时不必采取过度的安全措施，但对方若是违约，公正的强制执行会通过判决如期而至，于是你信任平时不打交道的法院。

中国社会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因为多年来的司法衰败，中国社会已经濒临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结果是政府依靠“维稳”来维持秩序，而社会则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正义。

亚辛斯基先生有句箴言说：“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个人的善恶观都是紧密受大环境影响的，大环境恶化，那么，个人的向善的一面则会收缩；相反，大环境好了，也会进一步激发人们向善的一面。

有人說：犹大告密，谁之过？酒桌上的戏谑语毕福剑吃自家饭，却被别人砸了锅，毕福剑网络视频事件在提醒著每一个人。跟朋友交往要格外小心：私下聚会聊天酒桌说的话未经同意绝不公开，此所谓君子把欢信任优先，老毕的饭局门，把我们从中国梦中惊醒，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在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道理很简单，一旦社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怀疑司法，这个社会就必然出现暴力横行的局面。所以，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动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惜成本来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尊严。而一个邪恶横行无忌、正义不得伸张的社会，必然是社会被原子化的社会。每一个公民个人即使肢体健全，也感觉自己在精神上孤立无援。

**独生子女为何如此反对父母生“二胎”？**

风青杨  文

4月2日，渭南的一名十二三岁的女初中生放学后未回家，从一小区楼顶坠下身亡。死者家属透漏，在楼顶发现一封孩子的遗书，大概内容是嫌父母打算生二胎，自己无法接受，便选择了以这种方式来“反抗”。（华商网）

确实难以想象，一个孩子会以这般激进的方式，阻止弟弟妹妹的出生。或许正如网友所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下独生子女一代太自私，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允许他人分享抢夺父母的爱。我相信每一位父母，特别是想要二胎的父母看到这样的消息会很震惊，或者认为这是一则偶然事件，但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看到的结果更让人惊心，采取各种方法反对父母生二胎的孩子数量还真不少：

2009年12月，重庆一名14岁花季女孩张洁给同学们留下一封遗书，想要在这个冬天结束自己含苞待放的生命，原因就是父听说父母要生第二个孩子后，以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议。2011年，一个7岁女童在被父母问到要给她生个弟弟或妹妹时候说：多个弟弟妹妹，会和我抢东西吃，如果你要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我就离家出走，我就死给你看！2014年8月，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办谭家村14岁男孩杀死1岁半妹妹，连续多次说“不后悔”。.....看到了上述事实，谁还认为是偶然事件么？

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他们害怕有了弟弟妹妹，会分走父母乃至全家大人对自己的爱，自己可能失去宠爱而被冷落。孩子的心理似乎可以被理解，但仔细想想，在那我们的爹妈生我们的时候咋没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写保证书呢？而且每个人都为自己多了个弟弟妹妹而由衷的感到高兴。到底是“时代进步的太快”，还是我们社会和家庭对孩子教育的缺失？

一方面，很长时间的单独二孩政策，让很多孩子都没有弟弟妹妹，所以不知道有弟妹的好。她唯一感受到的爱被分享的威胁。其实生二胎的一个好处是有利于培养老大与人分享的性格，老大在家里只有学会了容忍弟弟或妹妹，长大后才会宽容他人。如果老大担心父母生个弟弟或妹妹与他争宠，那么这个老大是很自私的。正因为老大有自私的性格，所以才更应该生二胎，否则，老大以后的自私性格将会变本加厉。因此，在生二胎问题上，不能对老大过度溺爱和迁就。

另一方面，现在的独生子女从小习惯了所有人以他为中心，缺少与别人分享的习惯。过度的爱，让孩子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如果父母在日常教育中，有启蒙式教育和适当的批评与惩罚，有意识培养孩子的心理耐受力、包容心，其结果将更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力。

记得韩国有一个鼓励生育的口号是：“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是兄弟姐妹”。另外，据2003年11月7日中新网报道：法国“路易-哈里”民意调查所在首个兄弟姐妹节来临前作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九成以上的法国人认为，家中有兄弟姐妹，乃是人生的一大福气。在独生子女家庭中，78%的人为没有兄妹感到遗憾。我相信，在中国也一样，如果教育得当，绝大多数的老大都会赞成父母生二胎。

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但团结协作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必须要反思的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如此自私，如此拒绝与他人分享，如此唯我独尊，精神变得如此脆弱任性，如此不堪一击，那真应该为我们得民族前途而担忧。因此，逼父母放弃二胎不单纯是家庭教育问题，不仅个体家庭需要反思，我们的整个社会更需要反思。

**深圳中学生校服走向世界的启示**

国内中学的校服出现在伦敦V＆A（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成为藏品！昨日下午，微博“英国那些事儿”发布的这则消息，瞬间引发全国网友关注，并登上新浪、百度等各大网站的实时热搜榜。记者昨日了解到，来自深圳的这套中学生校服也将被该博物馆永久收藏。

不过是一套中学生的校服，居然能被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且在瞬间引发全国网友关注，并登上新浪、百度等各大网站的实时热搜榜，这多少有点出人意外。

不客气地说，国内大多数学校的校服没给人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除了样式、风格单一以外，穿在身上松松垮垮，不仅分不出性别、显不出身材，而且尽显一种慵懒之态，根本体现不出学生活力四射、蓬勃向上的特质，也丝毫体现不出学生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以致很多学生都不愿意穿校服，家长也怨声载道，直呼花了钱还穿不出像样子的衣服，但由于教育部门的硬性规定，家长不得不忍痛花这个冤枉钱。

　　现在，深圳中学生的校服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展厅，且被该馆永久性收藏，其中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据专家介绍，深圳中学生的校服在色彩选择和线条设计上超越了目前国内大多数校服的局限，不仅具有可以跨越年龄、跨越地域的品位和流行元素，美观大方，而且穿着舒服，穿到哪儿都不丢人，这也是学生课后，以致毕业之后都愿意穿着的原因之所在。换言之，深圳中学生校服的设计充分尊重了学生的特点和个性发展，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对美的追求，才使得学生对其情有独钟，走到哪穿到哪，以至于成为在异国他乡觅知音的“红娘”。我想，这种人性化、唯美主义的设计理念，这种学生对校服超越时空的喜爱，恐怕才是深圳中学生校服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吧。

　　实际上，自1993年教育部明确规定中小学生必须统一穿着校服以来，校服就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但有关校服的种种非议也就随之而起，至今都不曾停止过，各种原因除了对校服的认识不足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服的采购权被各地教育部门所垄断，布料、款式就那几样，价格也是教育部门说了算，而且是强制购买，不买不行，再加上其中暗藏的利益输送，更令校服的质地、款式和质量大打折扣，这种做法不仅引起家长和学生的强烈不满，也是造成校服二十多年来“一贯制”的根本原因。

　　校服作为学生形象的一种标志，既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服装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应该体现出学校的风格与个性，体现出学生的风貌和修养，也应该与时代、时尚同步，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而这恰恰是深圳中学生校服最成功的地方，也是给我们最有益启示之处。由此看来，教育部门必须反思一个问题，就是何时才能放开校服的采购权，让各个学校和学生、家长自主决定校服面料、款式和价格呢？可以说，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有关校服的种种问题和非议就一天不会消停，更何况校服本来就是学校、学生自个的事情，教育行政部门干嘛非要越俎代庖呢？